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丛书
主编 马 达

生态美学视域中的 广东音乐

刘
瑾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丛书

主编 马 达

生态美学视域中的
广东音乐

刘 瑾◎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美学视域中的广东音乐/刘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丛书)

ISBN 978-7-5161-9495-9

I. ①生… II. ①刘… III. ①广东音乐—研究 IV. ①J63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490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周枕戈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24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进入 21 世纪，促进学校课程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加大地方和学校课程决策的自主权也成为大势所趋，校本课程开发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热点。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参与者和最终执行者，只有教师真正内化了校本课程开发理念并落实到教学行为中，我国教育部新的课程政策才能取得实效。校本课程的开发对增强学校课程之于学生发展的适应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校本课程开发不断向纵深发展。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岭南传统音乐承袭和发扬了岭南文化“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精神，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特质。岭南传统音乐包含了各种乐种、歌种、剧种、曲种。粤乐（广东音乐）、广东汉乐和潮州音乐是岭南音乐的三大乐种，还有咸水歌、渔歌、高堂歌、茶歌等广府民歌、客家民歌、潮汕民歌，黎苗瑶壮侗畲等少数民族民歌，春牛调、马灯调、彩船调、花灯调等歌舞音乐，粤剧、广东汉剧、潮剧、雷剧、客家山歌剧等戏曲音乐，木鱼、龙舟、南音、粤讴等曲艺音乐，佛教音乐与道教音乐等宗教音乐，由此构成了岭南音乐独有的音乐风格，并因此而享誉海内外。2009 年 10 月，由粤港澳三地共同合作申请的项目粤剧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说明以粤剧为代表的岭南音乐的重要文化价



值已为世人所关注和认可；如何将岭南音乐文化转换为适合于课堂教学传承的学科体系，成为广东地方院校音乐课程专家进行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的重要内容。鉴于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在广东省及港、澳、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居住地区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因此这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如何在民族音乐整体发展中传承民族音乐，长期以来一直是音乐理论界关注的问题。音乐教育历来承载着音乐文化传承的责任，音乐教育也因具有这一功能而得以存在和提升价值。然而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体现音乐教育的价值，还必须有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创造性工作，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转换为适合于课堂教学的学科体系，以便于音乐教师在音乐教育实践层面的操作。让优秀的本土文化良好地传承下去，理应成为岭南地区校本音乐课程开发的重要内容。教师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而概念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影响校本课程的开发品质。音乐课程专家需要努力实现音乐概念的通俗化转变，帮助教师把握课程开发的整体图像，明确校本音乐课程的理念、愿景和方向，阐释校本音乐课程的操作流程，提出可操作的校本音乐课程评价方法。因此，编写一套岭南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系列丛书，正是将地方特色音乐文化转换为课程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校本音乐课程的开发具有生成性，因此必须研究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以发展学生的音乐个性为目标指向，使校本音乐课程的开发与学生音乐修养的形成结合起来。这套丛书有以下特点：

一、丛书的“传承性”。在围绕音乐学教师教育办学目标、强调音乐教师教育专业化的前提下，丛书编写者根据课程类别的不同特点，在岭南音乐素材的组织、范例的选取、练习要求等方面，力求突出师范性特点，以便于教学和自学。

二、丛书的“学术性”。丛书体现了不同音乐学科自身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力求对民族音乐学体系、岭南传统音乐体系、音乐教育课程体

系的全面观照,以岭南音乐文化传承为出发点,精选岭南音乐中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关注岭南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势,吸纳最新的岭南音乐文化成果。

三、丛书的“可操作性”。在现有音乐课程教学体系中渗透校本音乐课程,使校本课程与传统课程体系相辅相成,具有实际意义,也具有可行性。例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岭南音乐视谱即唱》(2010)、《岭南音乐鉴赏》(2012)、《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地图:乐象潮州》(2013)、《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地图:乐象大埔》(2013)、《岭南传统音乐研究论稿》(2013)、《地域文化与岭南传统音乐传承研究》(2016)以及《生态美学视域中的广东音乐》(2016),都具有弥补、辅助、完善传统音乐课程体系的功能。《岭南音乐视谱即唱》补充了传统《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视谱即唱”内容未成体系的缺憾;《岭南音乐鉴赏》在传统《音乐欣赏》课的基础上,对岭南音乐欣赏进行学科系统化,丰富了原有音乐欣赏课内容,弥补了岭南传统音乐欣赏内容的欠缺;《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地图:乐象潮州》《岭南传统音乐文化地图:乐象大埔》《岭南传统音乐研究论稿》《地域文化与岭南传统音乐传承研究》《生态美学视域中的广东音乐》则完善了岭南传统音乐史论课程的教材建设。

通过系统教材的形式,呈现岭南音乐丰富多彩的曲目及表演形态,可以使学生通过学习和演唱、演奏岭南音乐经典曲目和剧目,了解岭南音乐文化,提升岭南音乐的鉴赏能力,获得岭南音乐文化熏陶,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代表的岭南音乐文化,实现课堂形式的传承。我们相信,在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岭南传统音乐文化传承项目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

马 达

2010年6月25日于广州星河湾

2016年10月6日修改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1)
二 广东音乐研究现状	(3)
三 本书的理论依据	(4)
(一)从自然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	(4)
(二)生态美学的出现及特征	(8)
(三)艺术领域的生态美学研究现状	(11)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14)
第一章 广东音乐中的生态理念显现	(16)
第一节 艺术展现生态理念之可能	(16)
一 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生态理念	(17)
二 音乐作品中的生态理念	(19)
第二节 广东音乐作品所蕴含的生态理念	(20)
第二章 广东音乐的文化生态	(26)
第一节 岭南文化生态体系与广东音乐	(26)
一 岭南文化之渊源及特征	(27)
二 广府文化：海洋文化与农业文化及族群意识	(36)



三 从“文化沙漠”到“文化强省”——广东文化生态中的 广东音乐	(40)
四 广东音乐在广东省的出版与研究	(53)
第二节 更宽广的视野：移民文化语境中的广东音乐	(59)
一 移民与移民文化	(59)
二 广东省的移民历史回顾	(61)
三 广东音乐在移民文化背景中的生态适应	(66)
第三节 是营养还是冲击——流行音乐文化对广东音乐的 影响	(68)
一 精神音乐：广东音乐对流行音乐元素的吸收	(68)
二 “文化快餐”式广东音乐之痛：当代流行音乐趣味对广东 音乐的影响	(74)
第四节 国际化都市中的民族文化发展：广东音乐面临的审美 难题	(78)
一 作为国际化都市的广州	(79)
二 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80)
三 传统与发展的关系	(81)
第五节 文化多样性对广东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启示	(87)
一 对“文化多样性”之含义的初步解读	(87)
二 文化多样性对粤乐的影响	(89)
三 彰显个性：文化多样性得以保持的基础	(98)
四 “新粤乐”与传统粤乐的并行发展	(102)
 第三章 广东音乐的社会生态	(108)
第一节 社会生态及广东音乐社会生态的变迁	(108)
一 社会生态概念解析	(108)
二 广东音乐的滋生地：富甲一方的沙湾	(111)



三 广东音乐全盛期的社会环境	(113)
四 广东音乐在当下社会中的境况概览	(114)
第二节 广东音乐社会身份的转型	(131)
一 早期广东音乐的娱人特征	(131)
二 华丽转身：“娱己”的私伙局	(133)
三 “私伙局”在广州的发展	(135)
第三节 非遗视野下的广东音乐	(142)
一 关于非遗保护的相关政策	(142)
二 非遗传承人的政策及广东音乐非遗传承人现状	(145)
三 非遗语境下的各项广东音乐活动	(152)
四 广东音乐与粤剧粤曲相比所处的弱势	(168)
第四节 在学校音乐教育生态中的广东音乐	(170)
一 音乐教育领域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日渐重视	(170)
二 高校对广东音乐的研究	(171)
三 广州高校中的广东音乐传承情况	(175)
四 广东音乐在广州中小学的传承情况	(178)
第五节 广东音乐在国内外的影响与流变	(186)
一 广东音乐在上海	(187)
二 广东音乐在天津	(206)
三 广东音乐在北京	(223)
四 广东音乐在香港的流传情况	(228)
五 广东音乐在海外的影响	(231)
第四章 广东音乐的精神生态	(238)
第一节 精神生态概念解析	(238)
第二节 休闲与世俗：广东音乐之精神追求的起点	(242)
一 从“休闲”与“世俗”概念的解析说起	(242)



二 广东音乐的物质性特征	(244)
三 广东音乐的直觉体验性特征	(244)
四 广东音乐的自由性特征	(246)
第三节 从感性到超越：广东音乐的精神取向	(247)
一 众说不一：关于广东音乐人文精神的评价	(247)
二 广东音乐的基本精神取向以及精神的超越	(249)
结语	(254)

绪 论

在文化生态的环境中，广东音乐与其他的文化因素之间有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广东音乐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其传承与发展有怎样的利弊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信仰却极度缺失的今天，广东音乐在精神生态与经济生态建构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随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广东音乐的生态境况及其特征将得到更为深入的澄清……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对中国岭南音乐颇有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展·艾伦^①在谈及岭南音乐的发展问题时曾这样说：“我总的感觉是创作和研究人才少，研究深度不够。许多问题的研究局限于技术层面，缺乏理论提升。应借助学院派和研究团体的力量，从哲学、美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诸多视野展开整合性研究，这样才能从理论上加强对本土音乐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觉意识，不至于在后现代主义强势音乐文化面前失去自己的固有身份。”^②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艾伦教授作为一个局外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岭南音乐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且就研究主体与研

① 展·艾伦（Alan R Thrasher），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民族音乐学家。

② 王少明：《后现代主义·民族音乐·岭南音乐——访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展·艾伦（Alan R Thrasher）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究方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笔者自学生时代便对广东音乐颇有兴趣,2010年到广州工作之后更是明确开始了对广东音乐的研究。艾伦教授的一番话令岭南的研究者们感到汗颜,同时也激发了笔者为广东音乐研究做出自身努力的决心。

因此,本书的研究价值也正在于此:

首先,作为一名音乐文化研究者,笔者自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发挥学科研究所长,力争吸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一条多视野的、整合性的研究路径。从音乐学的角度来说,仅仅对广东音乐的发展历史、作曲家及作品进行“历时性”的研究是不够的,对广东音乐进行“共时性”的研究,是对“历时性”研究的重要补充。而关注音乐形态、音乐本体乃至音乐事象中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恰恰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特征。目前,音乐学研究方法正呈现出日渐拓展与丰富的发展趋势,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与相互借鉴不仅从方法论的层面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研究路径,也为我们观察与分析所研究的对象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进行探索性研究成为可能。生态美学正是在研究者们重新审视传统美学,并对新体系的方法和途径进行积极构建的背景下出现的新的美学研究领域。因此,从生态美学的视角观察广东音乐,可以窥见其音乐形态的形成、音乐本体的特征、音乐活动的运行机制等因素与其存在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有助于将广东音乐研究推向深入。

其次,作为一名广州本土的学者,为广东音乐研究做出些许贡献,责无旁贷。广东音乐的发展地域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由于地域的特征而具有了城市音乐文化的质素。随着珠三角的社会状况、经济结构、文化语境、人文精神等因素的不断变化,广东音乐的创作与表演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反观之,广东音乐的发展所映射出的,恰恰就是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等各种因素所构建起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广东音乐调节、维持着音乐活动运行主体的社会关系,在文化生态



语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还满足了音乐活动主体的精神追求。因此，从生态美学的视角观察广东音乐，有助于深化对广东音乐的角色认知，并对广东音乐今后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启示与指引作用。

二 广东音乐研究现状

“广东音乐”又称“粤乐”，2006年6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广东音乐”并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中国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中十分重要的乐种之一，也是岭南三大乐种——粤乐、潮乐、汉乐——之一。迄今为止，对广东音乐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主要涉及音乐本体、乐器、历史沿革与发展展望等几个方面。

目前，广东音乐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广东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以及《广东音乐选集》、《吕文成曲集》、《广东汉乐三百首》、《粤北少数民族民歌选》、《广东音乐200首》、《何柳堂、何与年、何少霞广东音乐曲集》等。对广东音乐本体进行研究的论文如陆仲任的《粤乐旋法研究》（1988）、李复斌的《广东音乐旋法特征探究》^①等，对广东音乐的调式、调性、旋律特征等进行了考察；居文郁的《试论方言“声韵调”因素对广东音乐曲调风格的影响》^②指出了方言与广东音乐曲调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广东音乐所用乐器所进行的研究有文传盈的《椰胡在“广东音乐五架头”中的定位及其演奏特点》^③等。从历时性的角度对广东音乐的历史发展轨迹梳理与研究有吕淑新的《广东音乐改编的钢琴作品的历史沿革》（2009）、《谈吕文成对广东音乐发展的历

① 陆仲任：《粤乐旋法研究》，《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居文郁：《试论方言“声韵调”因素对广东音乐曲调风格的影响》，《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文传盈：《椰胡在“广东音乐五架头”中的定位及其演奏特点》，《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史性贡献》(2004)等。还有一些研究对广东音乐的现状、创新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如王少明的《后现代主义与广东音乐的创新与发展》(2004)将广东音乐置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予以观照,指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下广东音乐隐存的危机。另外,高胡演奏家、音乐学家余其伟的论文集《粤乐意境》(1998)从个人感性认识的角度对广东音乐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十分生动鲜活的评价。黎田的《粤乐》(2005)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广东音乐的著作,该著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重,上篇追溯了广东音乐的源流,下篇对广东音乐的乐种特性及律制、旋法、调式、曲式等进行了剖析,并附有部分代表性人物简介以及乐曲110首。

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倡理论的创新,而理论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的创新。在广东音乐研究领域,已悄然兴起一种以学科交叉为出发点,以视角更新为研究途径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平撰写的《谈广东音乐的生命力·张力·辐射力·文化场》^①一文,将广东音乐置于社会及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文章运用音乐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广东音乐的生命力等重要命题进行了阐述。

总的看来,目前对广东音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已有成果或偏重于对音乐本体及发展历史的微观考察,或者着眼于对广东音乐发展与创新的宏观展望,对广东音乐得以产生并发展所依托的整体生态环境进行考察的成果较少,有待于更多的学者投身到这一研究领域,不断探寻有效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域,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三 本书的理论依据

(一) 从自然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

生态学在其肇始之初,仅仅涉及自然生态的领域。1869年,德国

^① 罗小平:《谈广东音乐的生命力·张力·辐射力·文化场》,《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因里希·海克尔 (Ernst Heinrich Haeckel) 在《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学 (oekologie) 一词, 并创立了生态学这门学科。他说: “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 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① 因此, 最初的生态学主要研究动物与有机物及无机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词源上来看, Oekologie 源于古希腊语 “oeko” 与 “logie” 两词, 前者意为 “家庭成员”、“住所” 等, 而后者则意为 “科学研究”。同时, oekologie (生态学) 与 oekonomie (经济学) 使用了同一词根。有学者认为, 这表明 “生态学与经济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直至 1935 年, 从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 (A. G. Tansley) 对 “生态系统” 的定义可以看到, 生态学依然没有脱离自然生态的范畴。他认为: “所谓的生态系统, 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 (气候、土壤因素等)。它们是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因为它是以一个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③

从以上两位学者的理论来看, 生态学关注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丝毫没有渗入人文的要素。虽然如此, 自然生态学却向人们昭示了一种对主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的途径, 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尤其是 20 世纪中期以后, 生态学进一步吸取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的新方法后, 自身得到丰富与完善, 并形成了一门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 而其严谨有效的研究体系的逐步形成也使生态学研究方法能够被人文学科所借用成为可能。

20 世纪 60 年代, 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生物植物群体拓展至

①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7 页。

② [英] 彼得·沃森:《20 世纪思想史》, 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74 页。

③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9—20 页。



人类与社会的范畴，呈现出了转折性的变化。恩格斯曾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这种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生态关系问题，显然不仅仅是自然生态学与科学技术可以充分回答的，因为这其中已经明确显示了人文因素的介入。于是，生态学便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人文因素的解读。一旦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内容出现在生态学的研究之中，便形成了起步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密切交集。我们可以将此种现象理解为生态学研究内容向其他学科的拓展，或许还可以理解为人文学科在研究方法层面对生态学的借鉴。无论做何种理解，事实是，生态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学科——人文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属于人文生态学的范畴。1955年，此概念由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1902—1972）首次提出。他倡导建立专门的学科，目的是“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他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二者之间包含着“或为反馈或为因果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他之所以认为环境与文化之间具有因果的关系，理由如下：“一是环境与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二是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②

在中国，文化生态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但是学者对于文化生态学之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尽相同。王恩涌在1995年明确指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学科。”^③时至21世纪，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似乎悄然出现了转向。戢斗勇在《文化生态学》中将文化生态学定位为“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

② [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③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①。这里虽然言及了“环境”，却并未说明此环境的确切内涵是仅仅指向自然环境还是也包含了文化环境的要素。但无论如何，相较于此前“自然环境”的界定，这个概念显然已有所松动。2000年，梁渭雄和叶金宝在《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一文中不仅明确言及“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还进一步对“环境”的含义进行了解读：“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派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等。”^②自此，文化生态学之研究对象的人文特征日渐明朗。

2006年，戢斗勇在《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中对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做了更为确切详尽的描述。他指出，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系统、文化环境、文化资源、文化生态的态势，以及文化的生态规律”；^③并进一步指出，文化生态学“实际上研究的就是文化的结构，就是不同文化因子相互之间的结构和比例，从而构成文化的生态。因此，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及矛盾，是文化生态的基本关系和矛盾。而文化系统论中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是文化生态学的基础”^④。可见，此时的文化生态学已经将研究对象明确定位为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优势是显见的：对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所依托的文化生态进行研究，能够使我们更为有效地把握考察对象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并对各具特征的文化群体、文化历程之间的冲突、对话与交互作用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① 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 梁渭雄、叶金宝：《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学术研究》2000年第11期。

③ 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④ 同上书，第55页。